

H124/6

XIANDAI HANZI GUIFANHUA WENTI
现代汉字规范化问题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策划
苏培成 尹斌庸 编选

1513442

(京)新登字 0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字规范化问题/苏培成等编选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5.4
ISBN 7-80006-889-7/H·184

- I. 现…
- II. 苏…
- III. 汉字-正字法-标准
- IV. H124.1

XIANDAI HANZI GUIFANHUA WENTI

现代汉字规范化问题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8.125 印张 175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9.00 元

前 言

这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丛书之一,汇集了 26 位学者最近几年里发表的 27 篇论文,反映了现代汉字规范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现代汉字规范化包括字量、字形、字音、字义等几个方面,而本书主要是讨论字形规范化问题的。

汉字作为我国人民的重要交际工具,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汉字规范化是充分发挥汉字交际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汉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繁与乱的问题。为了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适应,我们对汉字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理和简化,确立并且推行了新的比较科学的字形规范,提高了现代汉字规范化程度。近

几年来,社会用字出现了一些新的混乱现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语言文字科学理论的错误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为了加强社会用字的管理,国家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和规定,并且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贯彻落实,取得了效果。在这一时期,现代汉字的理论研究也比较活跃。许多语言文字学家对汉字的整理和简化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为贯彻新时期国家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对那些不符合语文科学的、不利于贯彻国家语文政策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现在,我们把近几年来学者们撰写的有关汉字规范化的论文编选出版,向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份资料。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促进现代汉字规范化工作的开展,能够促进现代汉字的科学研究;我们希望这本书在实现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宏伟的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筹备期间,我们编选出这一本论文集,作为向学会成立献上的一份薄礼。感谢论文的作者,同意把他们的论文汇编出版;感谢原来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的编辑朋友,他们对论文的问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还特别感谢王均先生,他对本书的出版始终给予了帮助和指导。欢迎读者对本书编选提出意见。

编选者

1994 04 -20

目 录

剪不断,理还乱	吕叔湘(1)
谈谈汉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参考的某些历史经验	裘锡圭(6)
汉字的演进与规范	王凤阳(14)
汉字字形规范的理论 and 实践	苏培成(32)
字形规范化的重要依据	高更生(43)
谈异体字整理	高更生(54)
谈汉字简化	陈章太(67)
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	王 宁(81)
从纯文字学角度看简化字	裘锡圭(96)
汉字辩证四题.....	史有为(102)
简化汉字面面观.....	费锦昌(115)
《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	周有光(126)

实事求是地评价简化字.....	许长安(134)
汉字繁简问题琐议	程 荣(139)
论汉字的简化	胡瑞昌(149)
关于当前繁体字使用问题	倪镇封(158)
汉字简化与汉字教学	蒋仲仁(166)
关于汉字规范化问题的探讨	李长仁(176)
评对“识繁写简”的新解释	陈 一 詹人凤(185)
书法家与简化字	陈炜湛(195)
书法艺术与汉字规范化	何 年(202)
台湾学生认读大陆规范简化字的测查报告	
.....	尹斌庸 (美)罗圣豪(209)
《人民日报》海外版由繁改简意义重大	汪惠迪(214)
浅析四种印刷字体.....	傅永和(218)
现代汉字的“四定”.....	苏培成(225)
加强社会用字管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	仲哲明(233)
不能再错下去了!	袁 晔(248)

剪不断 理还乱

——汉字汉文里的糊涂账

吕叔湘

早些天觉得人不太舒服，躺着休息，找些旧报纸来解闷儿。一翻翻到一张1990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看看旧新闻，挺有趣。忽然发现在第3版上有一条新闻的文字有问题。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北京整顿字画市场》，里边有这么两句：

大量的伪劣字画竞相充斥市场……爱新觉罗·敏岵先生否认本家族中没有毓龙、兆裕此人，至于他们的字画，纯系伪造。（为了排印方便，原来的繁体字改用简体。下同。）

“充斥市场”好懂，前边安上个“竞相”就不好懂了。“本家族中没有毓龙、兆裕此人”，没有就是没有了，可又加以“否认”，那么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毓龙、兆裕此人……他们的字画……”，既是“此人”，那毓龙兆裕是一个，可又有“他们”，那就只能是两个人，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接着在第4版上有篇报道一位教授研究《越绝书》的，里边有一句是：

对该书形式、内容、语法、体例等逐一进行系统研究，并将之与《春秋》《汉书》及历代方志作了比较。

这“将之与”当然就是“拿来和”的意思了，可为什么要写成“将之与”呢？要用现代汉语，应该是“拿来和”；要用古代汉语，应该是“以与”；前面有“并”，那就连“以”字也不要，“并与”就行了。

第5版上有一条记内地在香港进修人员的座谈会，里边有一句：

我们在这里可以搭起友谊的桥樑。

查《辞海》，“樑”是房梁的“梁”的异体字，桥梁的“梁”从来不加“木”旁。

第6版上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在记古巴女排来到北京的一条新闻里有一句是：

在首都机场，她向中国关心她的球迷表示，她的腿伤已痊癒。

这里边的“癒”字是“愈”字的后起的异体字。

1955年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的整理异体字的通知里说：从1956年2月1日起，全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翻印古书可作例外。这作废的异体字里边就有这个“癒”字和前边讲的“樑”字。

第8版上有一篇讲苏州的宝带桥的特写，里边有一句：

苏州的宝带桥……建有五十三个桥孔……这在国内造桥史上还是先例。

“先例”这个词没有这样的用法。“还是先例”应该是“还没

有先例”。

看了这张旧报，触动了早就在脑子里折腾的关于汉字和汉文的问题。我说“汉文”，不说“汉语”，不是说谁说话都那么美好，只是因为说话如果不记录下来，影响不大，记录下来那就是“汉文”了。

汉字有什么问题呢？早年间，就说是百儿八十年以前吧，人们在公开场合写的字有一定标准，印书印报更不能马虎。可是汉字的笔划实在太多，所以很早就有所谓俗字，也就是“手头字”。但是这些字只能在私下流通，不能用于正式文件，更不能用来印书，除了在民间流通的唱本之类。这不但对于人民大众很不方便，对于国家普及识字教育也增加困难。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务院就公布了一批简体字，作为正式应用的文字。这些字的繁体只用来印古书，以及供书法家挥毫。同时也把许多汉字异体淘汰了。这样，汉字之中有一部分只有一种写法，有一部分有繁体和简体两种写法，以简体为正式通用的写法，繁体的写法加以限制；没有字有三种写法。人民大众也都以为这样好，遵照执行。

如此相安无事有将近十年。忽然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希奇古怪的字都出现了。连文字改革委员会这样的国家专管单位，在造反派的压力下也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有的字化得面目全非。虽然不久就停止试用以及最后正式报废，但是所起的消极作用已经相当广泛。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不合法的简写字。

同时，已经不作为通用字体的那些繁体字也静极思动。以香港影片的进口为契机，繁体字开始出现在银幕上，接着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于是大为时行。于是大街小巷看到的汉

字是繁繁简简，五光十色，有时连书刊上也不免出现混乱。《人民日报·海外版》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可是记者、编辑、以及投稿人，不见得都在文字之学（不是专门意义的“文字学”）上下过工夫，抱定“多两笔比少两笔更保险”的信念，于是出现了“桥樑”和“痊癒”。

讲过汉字，再讲汉文。汉族人写文章，远的不说，从春秋战国算起，到本世纪初为止，两千几百年，基本上是一个格式，通称叫做文言。都 20 世纪了，还按着两千年前老祖宗的模样写，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来了个白话文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 30 多年的斗争，白话文终于胜利了，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可是白话文原来只是用来写小说什么的，一旦要它主持大局，照顾全面，免不了缺这少那，只好四面八方取经。无论是词汇，是语法，都得实行“拿来主义”，从外国语拿，从文言拿。文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词汇丰富，成语、典故多，白话文在这方面取精用宏，确实得益不少。可是现在离白话文取得全面胜利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小时候受过文言训练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人对文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了解得不够，往往只是人云亦云，用错了也不知道错。像上面引的“先例”的例子，“竞相充斥”的例子，都属于这一类。还有另外一类例子，不能说是误用，只能说是滥用；不是不明词义，而是由于记得几个文言字眼，也不管妥贴与否，胡乱堆砌。下面是我早些时在一本档次不低的刊物的开卷第一面上抄下来的句子：“却使我终卷之后近一周的时间怅然若失，颇为悚然”；“甚而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绝无鲁迅先生的尖锐和犀利”。凡此种种，是不是都可以叫做历史的包袱？至于“将之与”，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一

直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报纸上的纯粹新闻报道，也就是特写、小品等等以外的文字，总是不肯用“他、她、它”，非用“之、其”不可；不肯用“把”，非用“将”不可，如此等等。真是不懂为什么。于是就出现了“将之与……比较”、“逼其交出”、“送其回家”之类的怪物。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乱用外来词语以及独家制造、谁也不懂的名词术语问题，牵丝攀藤一连五六行谁也断不开句读的问题。这些今天都不谈，反正大家都领教过。

总之，汉字里边的乱写混用，汉文里边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是当前叫人头痛的两个问题。

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 21 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这 20 世纪剩下的 10 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数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

（《读书》1990 年第 11 期）

谈谈汉字整理工作中 可以参考的某些历史经验

袁锡圭

在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在今后的汉字整理工作中认真加以参考的历史经验。对这一问题作全面论述，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下面只准备简单谈谈字数和字形变化这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先谈字数。一般都认为汉字是不断增多的，而且增加的数量相当可观。就大型字典收字的情况来看，确实是这样。例如：公元2世纪编纂的《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加上重文共10516个。本世纪70年代开始编纂，去年已出版了第一卷的《汉语大字典》，全书收字56000左右，是《说文》字数的五倍多。但是大型字典里收了很多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字，如果以各个时代一般使用的汉字为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汉字的数量其实是相当稳定的。

我们所说的一般使用的汉字，就是除去很生僻的字和比较专门的专业用字以后的实际使用的汉字，跟有些人所说的

“通用汉字”大致相当。在具体划定一般使用的汉字的范围的时候，人们很难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所以即使是统计现在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也很难得出一个公认的精确数字。统计历史上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困难当然就更大了。不过在这方面作一些比较笼统的估计，还是有可能的。由于掌握的资料太少，我们只能考察一下汉字发展史的上古和现代这两头的情况。先看现代汉字的情况。1965年1月由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字6196个。1981年国家标准局发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字6763个（其中比较常用的一级字3755个）。据郑林曦先生统计，现代书报刊物的用字数为6335个（郑林曦《精简汉字字数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据另一种统计，掌握了38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9%左右；掌握了52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99.99%左右（陈明远《数理统计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中国语文》1981年6期468页）。又据香港的一个统计，4份中文报在45天内所用字数为4687个（陈重瑜《试评汉字简化的一些论说》，《文字改革》1985年4期13页）。此外，从汉字构词能力的角度来看，据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统计，4990个汉字就“构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几乎所有的词”（据上引陈明远文469页）。从上面举出的一些数据来看，大致可以说，现在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是五六千左右（一般知识分子个人掌握的字数只不过两三千左右）。

接着来看一下上古汉字的情况。在已发现的内容比较丰富的古文字资料里，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殷墟甲骨文字是时代最早的一批资料。出土的殷墟有字甲骨

已达 15 万片左右（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 年 5 期），总字数当以百万计，大体上应该能够反映商代后期一般使用文字的情况。1965 年出版的《甲骨文编》根据当时已出版的 40 种甲骨著录书的资料，整理出单字 4672 个。此书《编辑序言》认为“其中有些字还可以归并；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的总数，约在 4500 字左右”（引者按：《甲骨文编》中也有应分而误合之字，但数量不多）。于省吾先生在 1973 年发表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说：“截至现在为止，甲骨文不重复的字约共 4500 多个。”（《文物》1973 年 2 期 33 页）在此后新发表的甲骨文资料里，出现了一些《甲骨文编》所未收的新字，但数量不是很多。如果把商代后期一般使用的汉字数量估计为 5000 左右，大概离事实不会很远。周代遗留下来的主要文献是十三经。据《十三经集字》统计，十三经共用单字 6544 个（据钱玄《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假字》转引，见《南京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 年 3 期 47 页）。十三经由于后世的传抄刊刻，用字情况已不完全是原貌，但是在单字总数方面大体上总还是能够反映周代的情况的。十三经的时代延伸得比较长，几乎包括了整个两周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秦汉时代的东西。如果有可能以周代某一段一二百年的时间范围为范围来进行统计，当时一般使用的字数大概要比十三经使用的字数低一些。

从上述情况来看，从商代到现代，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很可能一直在五六千左右。在这 3000 多年里，新字在不断产生，但是旧字也在不断退出历史舞台。二者相抵，字数的变化就不大了。一般说来，时代越

晚，新词增加得越快。但是由于复合词在汉语里越来越占优势，音译外来词又大多数用假借字记录，所以需要为它们造新字的新词却并不是越来越多。这是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有可能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

汉字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种字符（字符专指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记号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参看拙文《汉字的性质》，见《中国语文》1985年1期36页），跟拼音文字相比，的确有结构复杂、不易记忆的特点。这种性质的文字体系，单字如果太多，使用的人就会无法掌握。所以汉字里常常用假借等方法，让一个字在不同场合代表不同的语素，也就是用一个字代表两个以上不同的语素（对双音节或多音节语素来说，则是语素的一个音节）。但是如果单字太少，让一个字承担过多的任务，或是让一个字代表两个容易混淆的语素，又会影响记录语言的明确性，使用起来也会发生困难。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几乎始终同时存在文字分化和文字合并这两种相反相成的现象。前者如由“师”分化出“狮”（“狮子”在古代本作“师子”），由“陈”分化出“阵”（军阵之“阵”古本作“陈”）等等。从汉字历史上看，新字大部分是分化字。后者如顺逆之“逆”并入迎逆之“逆”，开耑之“耑”并入端正之“端”，又如汉字简化中把“鬥”并入“斗”等等。进行合并是为了控制单字的数量，进行分化是为了加强记录语言的明确性。字太多了固然不行，字太少了也同样不行。汉字里一般使用的字数从古到今变化不大，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建国后，有少数语文工作者主张通过以同音借代为主的合并文字的办法，大量压缩通用汉字的数量，有的人甚至想

把通用汉字砍掉一半以上。从 3000 多年的汉字发展史来看，这种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方块汉字还要长期使用下去的话，只允许汉字合并而绝对不允许进行新的文字分化，恐怕也是做不到的。

其次谈字形变化。这里所说的字形变化是广义的，既包括某一个字的写法的变化，也包括某一个语素前后使用不同的字，即原来用甲字表示后来改用乙字表示的那种现象。斗争的“斗”这个词本来用“鬥”字，由于汉字简化改用“斗”字，就是后一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一般都认为历史上汉字字形变化的主要趋势是简化。这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够全面的认识。

有的人把字形简化跟减少笔画等同起来。这跟历史事实有出入。

在汉字发展史上，由古文字演变为隶书，是最重要的一次字形简化。这次简化使带有图绘性质的象形的字符变成用点、横、撇、捺等笔画组成的字符，大大方便了书写。由于这次简化的主要目的是改造那些需要描画的不便于书写的形体，所以并不斤斤计较笔画的多少。有些字经过隶书的改造，笔画甚至反而增多了。如“日”字的外框在古文字里是可以一笔画成的圆圈，在隶书里却分解成了三笔（竖、折、横）或四笔（竖、横、竖、横）。但是隶书的“日”书写起来的确比古文字的“日”方便，所以我们还得承认由古文字的“日”变为隶书的“日”是简化。

为了摆脱古文字的象形性质以便书写，隶书不得不破坏了一部分字的结构。经过隶书的改造，独体表意字（大致相